

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陳進金

摘 要

本文分別從組織、訓練、作戰等三方面，試圖勾勒出忠義救國軍的歷史面貌。在組織方面，忠義救國軍承繼別動隊、別動隊教導團而來，其成立目的是為了因應抗日情勢的需要，以及配合情報工作的進行。無論從組織沿革、人事的安排與組織的整編，都可以看出忠義救國軍是由戴笠所創辦。

在訓練方面，從別動隊到忠義救國軍約分成四階段，其中第三階段以分期分類的訓練方式，奠定了忠義救國軍的學養技能，第四階段與中美合作所合作，藉由美籍教官的授課與訓練，使忠義救國軍對現代化軍事有了初步的啟蒙，對該軍戰力的提升大有裨益，也在後來的抗日與反共戰爭中發揮了作用。

在作戰方面，忠義救國軍經過美方教官訓練與美式裝備後，無論在抗日或反共的戰役上，都發揮了極大的戰鬥力。尤其是1945年的浙西戰役之後，共軍總是迴避與忠義救國軍接觸，也使國軍收復京滬的反攻計畫，免受中共的干擾得以順利進行。

總之，抗戰期間的忠義救國軍，是一支由戴笠所創辦的戰鬥武力；歷經幾次的整編改制，從一支諜報隊伍到全美式裝備的正規軍，其在各個階段都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做出了貢獻。是以，忠義救國軍可以視之為：一支以戴笠為首組織嚴密、紀律森嚴的戰鬥部隊。

關鍵詞：戴笠、忠義救國軍、抗日戰爭、中美合作社

Dai Li and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Chin-chi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Zhongyi jiuguo ju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 organization, training and combat ability. Since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was the recombination of the Special Task Force (*Beidong dui*) and the subordinations of the Special Task Force (*Beidong dui jiaodao tuan*), the Army's purpose certainly succeed Special Task Force's aim to resist Japanese invasion. According to leaders of this Army and the reorganization were ordered by Dai Li, it was clear that Dai Li founded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In terms of training, Dai Li applied different training by separate characters of task, so made members of this Army with enough military knowledge and skills. After the 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ACO) taking charge of partial training, this Army was faced with the American modernizing military knowledge and new combat skills. This improved the combat capability of the Army, and later cause the Army won some battles for resisting Japanese invasion or Communist attack.

Concerning the combat ability, the battling capability of the Army was largely improved after SACO's training and quipped with American weapons. For example, this Army successfully beat the Communist at the Zhexi Campaign in 1945, so the Communist avoided encountering with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as far as possible. Owing to i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over Beijing and Shanghai smoothly without disturbance from the Communist.

In a word,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was only an intelligence force at first, then transformed into an official Army because of SACO. The Army did play an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artment and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important role on anti-Japanese and anti-Communist wars.

Keywords: Dai Li, the Loyal Patriotic Army,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War, SACO

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陳進金**

壹、前言

1946年3月17日，戴笠（1897-1946）因飛機失事而意外身亡，章士釗（1881-1973）為戴笠題了一幅輓聯，被認為是對戴笠一生最公允客觀的評價，輓聯內容如下：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¹

戴笠，浙江江山人，譜名春風，學名徵蘭，字雨農；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更名笠。² 1927年4月，蔣中正實施清黨，戴笠提供情報資料給予時任黃埔同學會辦公處主任、黃埔軍校清黨委員會委員的胡靖安（1902-1978）³，將黃埔軍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3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5月16日。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¹ 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全集》並沒有收錄章士釗這幅被公認對戴笠較為公允評價的輓聯，該幅輓聯目前懸掛於浙江江山縣戴笠的故居中。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下冊，頁1067-1147。戴氏宗親網網頁資料，網址：<http://www.dai888.net/Photo/view.asp?id=74>（2011/9/19點閱）。

² 〈戴雨農先生年譜〉，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頁619、629-630。

³ 胡靖安，江西靖安人，黃埔軍校二期生，曾任黃埔軍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參謀、侍從室副主任，1946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江西省），參閱百度百科網頁，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106711.htm>（2011/9/19點閱）。

校中20餘名共產黨員予以揭發肅清；之後，受胡靖安之邀，負責蒐集各地軍政情報工作，是戴笠從事情報之始。⁴ 1928年，戴笠正式接替胡靖安，開始為蔣中正出掌情報特工工作；1932年，出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4月1日軍事委員會下成立軍事情報機構特務處，由戴笠任特務處處長，負責在全國各地建立情報組織，整頓警政，訓練工作幹部。1938年8月，為了因應中日戰爭的需要，必須強化情報機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乃將第一處移轄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稱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第二處則奉命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由戴笠擔任軍統局副局長，負責實際責任。⁵ 此後，以戴笠為首的情報王國乃逐漸建立。

抗日戰爭期間，戴笠所領導的情報機構，對於蒐集軍事情報、敵後打擊與牽制敵軍、檢舉奸商營私、揭發偽政權分子與共產黨的陰謀活動，以及負責監督水陸交通暢通的任務等，均有卓越的貢獻。不過，由於戴笠完全效忠蔣中正一人，其對於異黨（議）分子（包括共產黨員、汪偽政權分子，以及反對蔣中正的國民黨員、地方軍人等）的打擊與壓制不遺餘力，使得後人對戴笠的評價褒貶不一。愛之者，稱戴笠為「時代英豪」、「曠世奇才」，並對他的不幸罹難感到「痛予心」⁶；惡之者，則稱戴笠為「混世魔王」、「蓋世太保」。⁷

不過，上述對戴笠的愛之者或是惡之者，其愛與惡大都基於情感的直接反射，欠缺嚴謹的史學論證。以往學界無法客觀研究戴笠的原因，在於戴笠相關資料長期封存於軍事情報局。因此，有關戴笠的論述大多屬於回憶或紀念性質的文章，這些回憶性資料雖仍有其參考價值，但還是必須參考相關檔案文獻，才更具說服力。⁸ 2010年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與國史館合作，開始有計劃地整理戴笠

⁴ 〈戴雨農先生年譜〉，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頁632-633。

⁵ 〈戴雨農先生年譜〉，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頁644、711。

⁶ 引自蔣中正的輓聯，全文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績；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頁1067。

⁷ 參閱百度百科網頁，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25766.htm>（2012/9/19點閱）。

⁸ 與戴笠或軍統局有關的文章大都是回憶性質居多，僅舉數例如下：李甲孚，〈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傳記文學》，第67卷第3期（民國84年9月），頁53-57；鄧葆光，〈我與軍統〉，《傳記文學》，第61卷第4期（民國81年10月），頁71-76；吳智新，〈軍統見聞點滴〉，《傳記文學》，第61卷第4期（民國81年10月），頁77-82；魏大銘，〈評述戴雨農先生事功〉（上）（中）（下），《傳記文學》，第38卷第2期（民國70年2月），頁40-

史料，讓學界可以運用原始檔案資料來研究戴笠。是以，此時正是章士釗輓聯所說：「是非留待後人評」的最好時機。

以往有關忠義救國軍的記載，主要是根據國防部情報局所編印的《忠義救國軍誌》，其他相關紀錄並不多，即使是國防部情報局編印之《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中、下三冊近800頁中，有關忠義救國軍的紀錄僅佔0.5頁共計12行。⁹ 而《忠義救國軍誌》又屬於情報局內部機密刊物，能閱讀者少，是以各界對忠義救國軍的瞭解仍然有限；此外，抗戰期間東南地區的抗日行動中，忠義救國軍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於此，本文將從組織、訓練與作戰三方面來介紹忠義救國軍，同時分析戴笠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藉由本文能讓大家對忠義救國軍能有一初步的認識。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為《忠義救國軍誌》、《中美合作所誌》、《戴雨農先生全集》、《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以及原典藏於國防部情報局，已由國史館整理出版的《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等檔案文獻。

貳、組織：從別働隊到忠義救國軍

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以下簡稱「別働隊」），成立於1937年9月；翌年（1938）5月，易名為軍事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抗戰勝利後改編為交通警察部隊。¹⁰ 實際上，別働隊的成立緣起，與1937年的淞滬戰役有關。

1937年8月，中國集結了數十萬軍隊，包括由德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訓練的所有精銳部隊，全數投入淞滬戰場。8月18日，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將士第二書〉，指示應敵戰術五原則。¹¹ 20日，軍事委員會畫定江蘇南部及浙江為第三戰

45；第38卷第3期（民國70年3月），頁47-54；第38卷第4期（民國70年4月），頁94-100；徐文祺，〈我拜識戴笠將軍的由來〉，《傳記文學》，第48卷第3期（民國75年3月），頁94-99。

⁹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上冊，頁20。

¹⁰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頁1。

¹¹ 蔣中正所指示的應敵戰術五原則有：一、要以持久戰、消耗戰之決策，以打破敵人速戰速

區，蔣中正兼任司令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指揮。¹² 同一天，蔣中正頒發《第三戰區作戰計劃》，並接受陳誠擴大滬戰以牽制華北日軍的建議，決定把第十八軍調進淞滬戰場，也就是要以淞滬戰役來「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的基本原則。¹³

中日爆發淞滬戰事的同時，蔣中正也要戴笠積極籌組「別働隊」，發揮特工威力，打擊日軍，以協助國軍抗戰；亦即為了加強抗戰力量，戴笠乃發動上海地區群眾組織一支游擊部隊，擔任突擊破壞工作，協助國軍抗戰。1937年8月15日晚，戴笠在敵機猛烈砲火下，由京抵滬召集幹部，除查詢敵我兩軍情況外，同時指派余樂醒、張業、阮清源、文強、周迅予與劉戈青等，前往川沙、南匯、奉縣等地，調查可能用作協助國軍的民眾實力，並且與杜月笙等上海士紳研商，如何結合民眾武力，以從事救亡圖存的工作。¹⁴ 戴笠一方面商請地方上有力人士出面號召，一方面呈報軍事委員會，8月底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有吳鐵城、俞鴻鈞、宋子文、貝祖貽、錢新之、杜月笙、楊虎、張治中、俞作柏、張嘯林、劉志陸、吉章簡、蔡勁軍、戴笠等。¹⁵ 「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後，在上海地區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學生、工人與幫會成員紛紛參加；9月上旬，即編成部隊，名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¹⁶ 因此，別働隊成立的緣由即是為了因應抗日情勢的需要。

決之企圖。二、要立於主動，敵我攻守，待其氣衰力疲，我即乘機出擊。三、固守陣地，堅忍不退，以深溝高壘厚壁，粉碎敵人進攻。四、要利用民力民物，處處設阱設防，人人抗戰殺敵。五、要講求防制敵機、大砲、戰車、毒氣之戰術，使其攻擊無效。參閱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卷4，上冊，頁100。

¹²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1。

¹³ 陳誠認為：「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鐵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失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按：實施持久消耗戰略）。」參閱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上冊，頁53；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4年），頁13-14。

¹⁴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7。

¹⁵ 張霽之，《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118。

¹⁶ 張霽之，《戴笠與抗戰》，頁118。

其次，抗日戰爭爆發後，許多淪陷區處於日軍與偽政權雙重統治，使得敵後情報工作的蒐集遭到諸多的阻礙與挫折；因此，沒有敵後武力的適切配合與支持，實在難以開拓敵後工作、難以洞悉敵情。是以，成立別働隊的另一原因，就是為了配合情報工作。1937年9月，別働隊在上海成立後，即迅速發展，而於淪陷區積極活動，打擊日軍，包括偵殺奸偽、破壞敵後交通、焚燬敵軍倉庫、工廠等，並且順利展開敵後情報工作。¹⁷

從上述別働隊成立緣起可知，其成立目的有二：一、因應抗日情勢的需要；二、配合情報工作的進行，而居間的關鍵人物即為戴笠。茲說明其組織沿革如下：

一、別働隊

1937年9月，在上海成立別働隊，共編成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計有官兵10,000餘名，分布於滬西、浦東及蘇州河與京滬、滬杭鐵路沿線，其主要工作在於協助國軍作戰。另外，設立青浦技術訓練班、松江特訓班與佘山教導團，輪流調訓官兵，以訓練官兵作戰、偵探、破壞等技術及幹部指揮領導能力，同時加強官兵政治思想教育，以達到集中官兵意志、統一官兵意志的目的。此外，同年8月已於天津附近組織灤榆游擊隊，約有2,000餘人，司令王天木、副司令陳恭澍，由戴笠直接指揮，在敵後從事破壞擾敵活動。11月，灤榆游擊隊改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北方支隊」。¹⁸至此，別働隊總兵力約有13,000人，進行對敵偽制裁、奇襲、偵察、破壞等任務。

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委員有：杜月笙、楊虎、錢永銘、劉志陸、張嘯林、貝祖貽、張治中、戴笠、宋子文、吳鐵城、俞鴻鈞、吉章簡、蔡勁軍、俞作柏等，其中杜月笙、戴笠、劉志陸三人為常務委員，戴笠並為書記長，負實際責任。蘇浙行動委員會內設有機要、總務、偵諜、軍事、技術、調查、交通通信與宣傳等八組。¹⁹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設總指揮部，以劉志陸為總指揮，戴笠曾經請蔣中

¹⁷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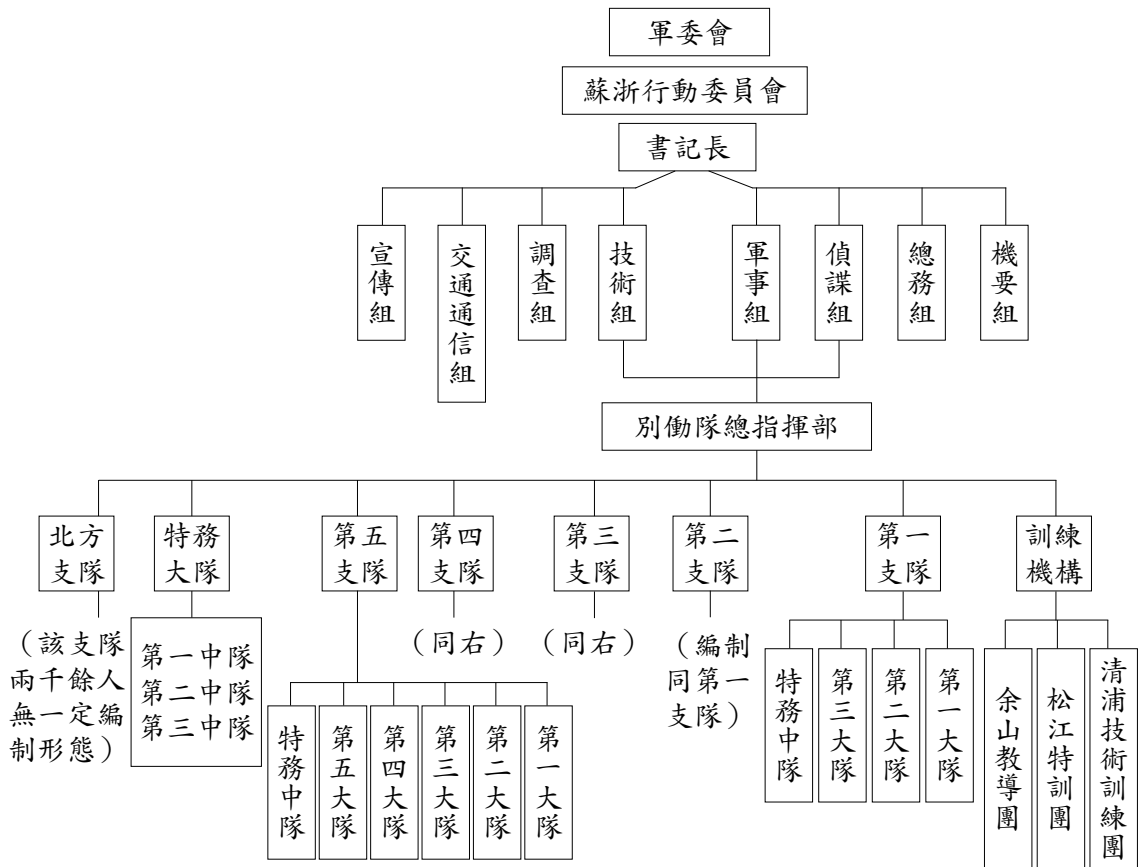
¹⁸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7-8。

¹⁹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5-6。

正電告各機關和部隊，劉志陸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總指揮，以免發生誤會。²⁰ 別働隊總指揮部下轄五個支隊及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長何行健、第二支隊長陸京士、第三支隊長朱學範，上述三支隊組成分子多為幫會分子與上海勞工分子。第四支隊長張業，官兵多為京滬一帶原有之情報及行動工作人員。第五支隊長陶一珊，該支隊是由上海地區曾接受國民軍事訓練的青年，及高中以上學生軍訓總隊官生合編而成。特務大隊長趙理君，該大隊的官兵多為京滬一帶的情報與行動工作人員。北方支隊指揮王天木、副指揮陳恭澍，其官兵多為原天津地區的情報行動人員。²¹ 蘇浙行動委員會暨別働隊組織系統表如下：

²⁰ 〈戴笠電錢大鈞請以蔣中正名義電告派劉志陸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總指揮〉，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3-4。劉志陸早年於桂系軍人莫榮新麾下任職，後為張宗昌直魯聯軍第三路總司令兼十三軍軍長，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脫離張宗昌，前往上海與青幫黃金榮、杜月笙來往密切。蘇浙行動委員會指揮部成立時，因其軍事經歷並與杜月笙交善，被杜月笙推薦為總指揮；之後，劉志陸被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委任為潮汕地區行政專員，1941年因心臟病死於行政專員任內。參閱謝哲邦，〈關於劉志陸的一點史料〉，收入廣州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廣州：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輯，網址：http://www.gzxxws.gov.cn/gzws/cg/cgml/cg4/200808/t20080827_5100.htm（2012/6/12點閱）。

²¹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8-9。



資料來源：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0-11。

從別働隊的組織與成員，可以看出是杜月笙與戴笠力量的結合，其中以劉志陸為總指揮即為杜月笙所提出，而戴笠同意電請蔣中正派劉志陸為總指揮，除了劉志陸是杜月笙所推薦外，亦有以劉氏來壓制陸京士的意思。²² 再者，第一支隊長何行健、第二支隊長陸京士、第三支隊長朱學範都是杜月笙的學生，上述三支隊的組成分子亦多為幫會分子與上海勞工分子，這是杜月笙完全能夠掌控的力量。第四支隊長張業、第五支隊長陶一珊、特務大隊長趙理君以及北方支隊指揮王天木、副指揮陳恭澍，則都是戴笠舊幹部，其成員亦以原有之情報及行動工作

²² 〈戴笠電蔣中正擬成立上海行動委員會並請派劉志陸為總指揮〉，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34-135。

人員為主，這是戴笠能夠完全掌控的力量。

二、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團

1937年11月，上海保衛戰告一段落，別働隊的任務是負責掩護國軍安全撤退任務，戴笠曾經指示陶一珊：不僅必須達成協防南市，掩護國軍安全撤退任務，更要從速在十六埔與法租界相連之處，選擇堅固建築物體，決心作最後孤軍奮鬥之準備。²³ 根據軍事情報局所編輯的《戴雨農先生全集》記載：陶一珊原本準備在十六埔與法租界相連的大倉庫內，興築一條秘密通道與日軍周旋，但因法租界不同意而作罷；最後，陶一珊部隊苦守三日，共掩護了近10萬人進入法租界，達成戴笠所賦予的任務。²⁴ 三日內，是否能掩護近10萬人進入法租界，令人懷疑，但由於欠缺其他資料辯證，暫且存之。不過，有關1937年上海保衛戰，學者認為：「國軍在淞滬戰役所表現的高昂戰鬥意志及活潑大膽的戰略構想，在我民族近一世紀的禦外軍事上均可謂空前。」但其撤退時機，也確實值得檢討。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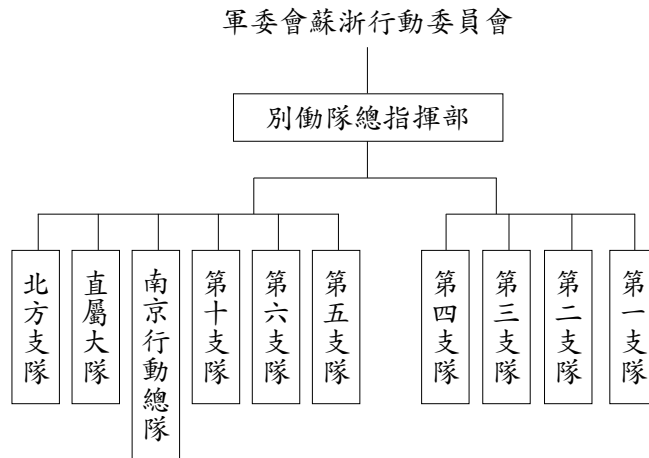
12月，蘇浙行動委員會軍事組長俞作柏，從上海帶領約1,700餘名隊員撤退至抵達安徽省祁門縣，奉命整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第一團」，由俞作柏任團長。1938年1月，原第一支隊由何行健支隊長帶領，經奉化撤退至遂安，與毛森主辦之江山幹部訓練班全體官生，及東洋巍山之「浙東大隊」官兵等合併編成「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第二團」，以何行健為團長；同時將別働隊總指揮部改組為別働隊教導總團部，戴笠兼總團長，俞作柏副之。²⁶ 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總團組織系統表如下：

²³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1。

²⁴ 〈戴雨農先生傳〉，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臺北，編者，民國68年），上冊，頁71。

²⁵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頁8-9。

²⁶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8-9。



資料來源：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3。

同一年（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蔣中正「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其以加強敵後游擊工作」的命令，乃派遣軍政幹部潛入淪陷區，配合留置淪陷區的幹部與武裝部隊，展開收容擴編的工作，先後編成了7個支隊和南京行動總隊，還另外成立一支直屬大隊，至於北支大隊的人事編制則照舊。²⁷ 是以，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團的組織與成員，承繼別働隊而來，仍然是戴笠與杜月笙力量的結合。

三、忠義救國軍

1937年11月9日，淞滬失守，國軍西撤，但別働隊為了能夠繼續保持東南要地，以配合抗戰；乃於1938年5月將別働隊改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以下簡稱「忠義救國軍」），並於漢口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由戴笠擔任總指揮。²⁸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由漢口出發，經江西

²⁷ 「蔣中正電薛岳令蘇州無錫南京等地別動隊官長限期達成任務」，〈籌筆—抗戰時期（十）〉，《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10-038；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1-12。

²⁸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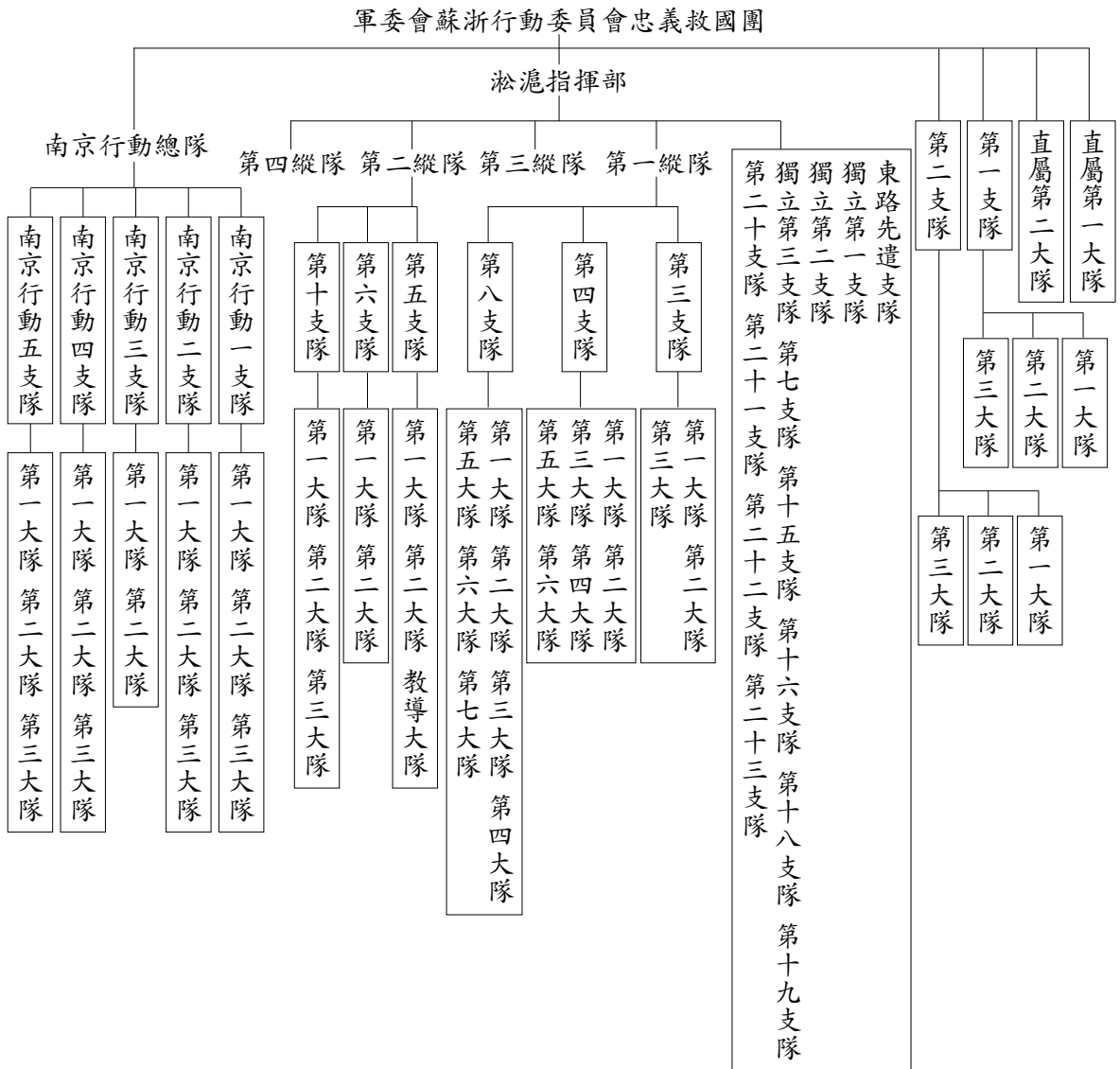
南昌、安徽屯溪，進駐浙江孝豐，接替原別動隊教導總團部之指揮權，其主要任務除了為對日軍作戰外，也繼續收編流散國軍，號召地方武力，以擴大組織，強化抗日實力。其中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於北平、天津一帶活動，給予日軍極大威脅，日軍乃派遣陸空軍數千人全力圍攻；1938年底，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被圍困於河北寶坻附近，終因彈盡援絕而全軍覆沒。²⁹

1939年3月，忠義救國軍在上海成立淞滬指揮部，以加強京、滬及浦東地區的情報掌握與作戰指揮；4月，於浦東成立第一縱隊，由何行健擔任縱隊指揮；6月，收編浦東張維邦部為獨立第一支隊，調阮清源為第二縱隊指揮；7月，浦東成立第三縱隊，縱隊指揮由淞滬指揮部參謀長徐志道兼任（後由郭履洲接任）；12月，浦東成立第四縱隊，縱隊指揮由徐志道接任；此外，並於南京成立南京行動總隊。至1940年春，忠義救國軍已擴編為4個縱隊及1個南京行動總隊，共轄26個支隊及2個直屬大隊，總兵力有29,611人（歷年來傷亡人數3,400餘人未列計在內），長短槍17,785枝，分布於浦東、南京、上海，以及京滬鐵路、滬杭鐵路、京杭國道一帶。³⁰ 忠義救國軍在上述游擊隊根據地展開政治工作，布置諜報交通網，配合江南特工打擊與牽制敵人，並且破壞淪陷區交通設施，以及發動民運、策動偽軍反正，和進行奸偽的捕殺行動等，為中國的抗日戰爭貢獻心力。³¹ 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組織系統表如下：

²⁹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4-15。

³⁰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5-16。

³¹ 1940年忠義救國軍成立，至1946年3月改制為交通警察總局止，期間有多次整編，本文不一一說明，詳情可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6-22。



資料來源：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16-17。

1944年9月，戴笠為了擬一份報告給蔣中正時，曾經指示部屬細數忠義救國軍的貢獻，以便呈請蔣中正准免於裁汰忠義救國軍，該一手令間接說明了忠義救國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其手令內容如下：

一、別働軍各縱隊自經美方訓練後，顯著成績不止此數，如第五縱隊之破壞汴新鐵橋，如第四縱隊之在湖潭白沙州襲擊敵寇，如第一縱隊之在清遠附近殲敵情形，均應查明列入。二、除別働軍各縱隊與忠救軍全部係奉委座之批准，吾人應呈請委座准免裁汰。³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忠義救國軍就近協助京滬杭地區的受降與復員工作；1946年1月21日，忠義救國軍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乃奉准改制為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蔣中正條諭：以吉章簡為局長，馬志超、徐志道為副局長，並歸戴笠負責整編督導。³³

不過，忠義救國軍改制為交通警察總局的過程並不順利。1945年10月，軍政部就曾研議撤銷別働隊、忠義救國軍；為此，戴笠特別致電王耀武，準備向軍政部長陳誠有所陳述，該電文提到：「因別動軍與忠救軍，軍政部均主張撤銷，弟擬向陳辭公有所陳述也。」戴笠主張應將別働隊與忠義救國軍，投入於北方的經營，他說：

華北及東北情形均難樂觀，弟意今後應集中力量經營北方，方能分校座之憂勞，與對國家方有更大之貢獻。³⁴

由上封電文內容，得以窺出戴笠的識見及對戰後中國情勢的理解，遺憾的是戴氏於翌年（1946年）3月17日即因座機失事而英年早逝，無法進一步率領別働隊、忠義救國軍經營戰後的華北、東北。事實上，1945年11月6日，蔣中正已准予將忠義救國軍改編為交通警察總隊，但是直至12月15日軍政部仍未進行改編，並有先裁忠義救國軍一半之議。戴笠乃再以手令要求部屬：將軍政部不照命令改編忠義救國軍之事的原委查明，準備呈報蔣中正裁奪。³⁵ 經過戴笠的力爭，忠義救國軍才順利於戰後改制為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

³² 〈戴笠手令別動軍各縱隊與忠救軍應呈請准免裁汰〉，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08-110。

³³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24。

³⁴ 〈戴笠電王耀武擬向陳誠陳述軍政部主張撤銷忠救軍一事〉，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11-113。

³⁵ 〈戴笠手令速將軍政部不照命令改編忠救軍事查明呈報蔣中正〉，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14。

從以上所述忠義救國軍的組織沿革可以得知，忠義救國軍是承繼別動隊而來，主要活動地點集中於京、滬、杭一帶，而負責實際責任者一直是戴笠。蔣中正對戴笠所領導的特工人員亦極為重視，幾乎每一個月都會要求戴笠呈報能力成績優秀者，予以敘獎。³⁶再者，從人事的安排與組織的整編，更看出戴笠幾乎可以完全主導。如1938年救國軍參謀處長郭履洲，與副總指揮俞作柏與參謀長徐光英之間有所嫌隙，戴笠乃立即致電郭履洲，要求其尊重並服從俞、徐二人領導，其電文如下：

特急屯溪救國軍總指揮部郭履洲兄勳鑑：此次成立總指揮部出發前方，原希即行率部挺進京杭國道以北地區，藉以策動沿線各部隊積極動作，牽制敵軍之行動，藉此達成委座給予吾人之使命也。弟因事羈不能親赴前方，與諸同志共同策進一切，殊深焦灼。俞副總指揮與徐參謀長均係革命先進，既熱心於黨團，復對弟多所愛護，故望兄尊敬之、服從之，即有意見，亦須委婉陳述，不可有辯論之形態。兄與弟同事有年，且係同學，做事要識大體，勿稍有專橫之行為，為幸。³⁷

再以1940年整編忠義救國軍為例，更可以看出整編計畫與辦法，幾乎由戴笠完全主導與指揮。³⁸ 1945年3月，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有意請辭總指揮時，戴笠特別致電慰留，他說：

敵寇絕不能亡中國，亡中國者因中國人自己不能團結也。奸匪絕無力消滅我忠義救國軍，消滅忠義救國軍者，因本軍高級幹部彼此不能精誠親愛之故也。當此敵偽奸匪協議謀我之時，兄為革命之黃埔學生，兄為忠救軍之總指揮，兄不可言辭。即幹部同志中有冒犯兄之處，亦應力事忍耐，以寬大之氣度，偉大之精神，予以諒解。兄如於此時言辭，勢必動

³⁶ 「蔣中正電示戴笠月底前詳報特務處人員去年總成績賞罰表與報銷」、「蔣中正電戴笠召見二十六年特務處特獎記公人員並申誠懲罰人員」、「蔣中正電戴笠呈報特務人員能力成績優者五至十人」，〈籌筆—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09-054、002-010300-00010-037、002-010300-00012-011。

³⁷ 〈戴笠電郭履洲尊重服從忠救軍副總指揮俞作柏與參謀長徐光英〉，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9-11。

³⁸ 〈戴笠呈蔣中正有關金華會議商議忠救軍整編計畫與辦法〉，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22-38。

搖軍心，則本軍之失敗可立待也。……兄於此時絕無離忠救軍總部之道理，萬希勿再言辭。³⁹

由上述電文內容得知，忠義救國軍領導間存在著人事方面的問題，但戴笠仍然可以掌控全局。足見，忠義救國軍不僅是戴笠所創辦，更可視為是以戴笠為首的一支組織嚴密、紀律森嚴的戰鬥部隊。

叁、訓練：分期與分類

忠義救國軍不僅是一支游擊部隊，實際上是一支情報工作部隊。所以忠義救國軍的戰鬥，不只是游擊作戰，而且還具有政治作戰，心理作戰，經濟作戰，思想作戰等特質。⁴⁰ 是以，為了達成上述多項作戰目標，忠義救國軍就必須對其官兵施以適當的訓練，使其具備一定的學能，才得以完成組織所賦予的工作與任務。就訓練原則而言：主要分為精神訓練與學術訓練。精神訓練的要點有三：一、堅定雪恥復國冒險犯難之意志；二、養成服從命令嚴守紀律之習性；三、培育團結互助榮辱與共之精神。至於學術訓練的重點則為：一、以逼真近實，實踐篤行為訓練基礎，戒除空洞抽象教育方法，俾學以致用。二、把握訓練方針，遵循訓練程序（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從簡入繁，由易及難），如期完成必要之全能訓練。三、重視啟發教育，機會教育，以提高受教人員之求學情緒，使能獲致訓練之預期效果。⁴¹

就訓練方式與內容而言：由別働隊至忠義救國軍期間，為了適應作戰需要與部隊特質，所採用的訓練方式是「分類分期之集體訓練」，約可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37年10月1日至11月13日止，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官兵輪訓時期，主要是由青浦技術訓練班、松江特訓班、佘山教導團三機構負責官兵的輪訓工作。戴笠自兼各訓練班主任，另派副主任主持其事，清浦技術訓練班副主任

³⁹ 〈戴笠電馬志超勿再言辭忠救軍總指揮一職〉，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63-168。

⁴⁰ 葉翔之，〈忠義救國軍誌序〉，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序言，頁1。

⁴¹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27。

為余樂醒、淞江特訓班副主任為汪祖華，教導團則由上述兩訓練班共同負責督導訓練。

第二階段：自1938年1月至同年5月止，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第一團、第二團全體官兵同時整訓時期，由教導總團部（總團長為戴笠）負責，集中全力，進行訓練工作。

第三階段：自1940年3月至1941年1月止，為忠義救國軍自淪陷區撤退至後方基地，集中孝豐施以訓練，因訓練準備周延，訓練時間較為長久，其訓練成果亦佳；是以，忠義救國軍各部隊於1941年2月再度挺進淪陷區，為抗日戰爭貢獻心力。

第四階段：自1943年6月至1945年4月止，為中美特種技術第一、第八訓練班，以中美合作教育及美式武器，陸續調訓與裝備忠義救國軍之時期。經此一階段的訓練裝備後，忠義救國軍的戰鬥實力日益強大。⁴²

第一階段的訓練內容：以清浦技術訓練班為例，受訓的學員是以各部隊中下階級幹部為主，約400人，訓練時間為兩週，其訓練目的在「培養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幹部，達成其統馭與指揮部隊從事戰鬥暨對敵爆破與偵察敵情等目的之全部能力訓練。」實施的課程軍事教育占50%，爆破及偵察教育占30%，政治教育占20%。⁴³

第二階段的訓練內容：訓練對象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第一團、第二團全體官兵，時間約5個月，訓練目的為「加強官兵政治信仰，效忠精神，鍛鍊堅強體魄，增進作戰技能，使其蔚為勁旅，適應敵後游擊工作。」實施的課程政治教育占30%，軍事訓練占60%，一般訓練占10%。政治教育的重點為：加強其對三民主義之信仰，對抗敵建國國策之認識，及對蔣中正的效忠。軍事訓練的重點為：增進軍事知識，鍛鍊戰鬥技能，培育堅強體魄，以適應作戰需要。一般訓練的重點為：培育幹部統馭指揮能力，促進官兵精誠團結與服從負責精神，養成官兵整齊、嚴肅、刻苦、耐勞、切實、機敏、剛毅、果敢、守密等習性。

⁴²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28-29。

⁴³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29。

第三階段的訓練內容：訓練對象是忠義救國軍第一支隊、第二支隊、第三支隊、淞滬行動總隊、特務大隊等單位，訓練目的為「團結精神教育，統一意志，增進政治知識，鍛鍊堅強體魄，發揚革命精神，加強抗敵技能。」訓練時間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教育（1940年3-8月），打破受訓部隊建制，實施分類訓練，即將全體受訓部隊區分為「軍官隊」、「軍士隊」、「機槍連」、「通信兵隊」、「輸送兵隊」、「技術隊」、「輕機槍訓練隊」、「政訓隊」、「爆破訓練班」與「雜兵」10類，分別集中訓練。後期教育（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受訓官兵歸還原有之建制（即各支隊、行動總隊、特務大隊），繼續進行戰鬥體制的學科訓練。

此一階段訓練的課程主要大致區分為學科與術科，包含軍事、政治、技術等科目，其具體內容在各項教育計畫中都有詳細的記載，這些計畫有《忠義救國軍幹部訓練班軍官隊教育大綱》、《忠義救國軍幹部訓練班軍士隊教育大綱》、《忠義救國軍幹部訓練班技術隊教育綱領》、《忠義救國軍幹部訓練班政訓隊教育大綱》、《忠義救國軍各團（特務營）輕機關槍訓練隊教育大綱》、《忠義救國軍技術營爆破訓練班教育大綱》等。⁴⁴ 以《忠義救國軍幹部訓練班軍官隊教育大綱》為例，學科有：軍事學（地形學、築城學、兵器學、交通學、爆破學、偵探學……）、黨義（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人精神教育、領袖言論、抗戰建國綱領及抗戰必勝論）、政治（日本滅亡中國之陰謀、國恥史、群眾心理、國民公約）、普通科學（日語）；術科有：戰鬥教練、陣中勤務、射擊教練、劈刺教練、築城實施、夜間演習、游擊戰、爆破實施、測繪實施、體操、其他等。⁴⁵

第四階段訓練內容：訓練對象是忠義救國軍之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第三縱隊，暨南京、淞滬、浙東、京蕪、澄錫虞等5個行動總隊及總部直屬部隊等。訓練的目的為「促進官兵熟習特種游擊戰暨敵後破壞諸制式法則，及各種新式武器器材之使用，充實其學術能力，並陶冶其高尚品德氣節，加強其體力鍛鍊，養成嚴肅之軍紀，鞏固團結之精神，堅定必勝之信念，使其成為學技優良，意志統一、精神團結、刻苦耐勞、冒險犯難之堅強勁旅，以達作戰之諸般要求。」訓練

⁴⁴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31-41。

⁴⁵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31-32。

時間每期以 2 個月為準，訓練內容主要是根據《軍委會中美特種技術第一訓練班訓練計畫》，該計畫並附有《軍委會中美特種技術第一訓練班教育計畫》，說明其教育重點及時間分配為：「以接受美籍教官之特種軍事技術及本國之精神訓練為主。」美籍教官課程占受訓全期時間的 75%，本國教官課程則占全期時間的 25%。其教育訓練的要旨是：「精神教育以思想及紀律為主，務使官員生士兵均能澈底瞭解三民主義之真諦，絕對信仰領袖，絕對服從領導著命令，恪守紀律，養成苦幹苦守、澈根澈底，劍及履及、奮鬥犧牲之精神。」「學術教育以啟發天才熟練為主，必須講做合一，學以致用，達成理想訓練之功效。」⁴⁶

此一階段，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的訓練課程，計分為中國課程與美國教官課程兩方面，中國課程學科計有 4 類：一、軍事科目，學科有步兵操典、基本戰術；術科有基本教練、射擊教練、戰鬥教練、陣中勤務。二、技術科目，學科有情報業務、城市暴動、行動技術；術科有夜間演習、行動演習。三、政治科目，學科有國父遺教、領袖言行、精神講話、特約講話；政訓有小組討論、各項競賽、各種集會。四、其他演習，包括防空演習、行軍演習、緊急集合演習。美籍教官教授的課程分成軍事科目與技術科目兩類，軍事科目有飛機識別、偽裝及掩護、地圖判讀法、戰地急救法、觀測、射擊目標之指示及火戰指揮、搜索、偵察、埋伏、襲擊、巷戰、夜間步哨勤務、夜間演習、野外演習、手榴彈、手槍、湯姆生槍等。技術科目則有擒拿術、連絡及秘密通訊、破壞、情報、爆破等。⁴⁷

從上述四階段的訓練內容可知，第一、二階段的訓練時間不長（約 2 週至 1 個月），短短 2 週的時間，就想要達成其「統馭與指揮部隊從事戰鬥暨對敵爆破與偵察敵情等目的之全部能力訓練」，似乎過於高估訓練的成效。而第三、四階段的訓練則各具特色，第三階段，分期（前後期 10 個月）分類（10 類）的訓練方式，奠定了忠義救國軍的學養技能，使之成為思想忠貞的一支戰鬥勁旅。第四階段的訓練，則開啟了與美方合作的事例，藉由美方教官所講授的科目，是屬於現代化戰爭所必須瞭解者，故在此一階段忠義救國軍開始接受現代化軍事學術科的訓練，對其戰力的提升，影響甚鉅。

⁴⁶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 44-45。

⁴⁷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 56-59。

觀察忠義救國軍的訓練的內容與方式，幾乎都由戴笠所完全主導。以第四階段的訓練為例，戴笠曾手令雄村（安徽省歙縣）等三訓練班由中美所派美方教官訓練，其手令原文為：

別動軍問題，應即緊縮內部，加強部隊之訓練，除雄村、南岳、洛陽附近三個訓練班，由中美合作部門派遣美方教官擔任訓練外。其餘各戰區之別動軍亦應由[美]方派遣教官前往訓練，以其于短時期內將別動軍完全裝備起來。⁴⁸

1944年11月，戴笠又電告馬志超等別動軍司令部應與中美所作戰組密切聯繫；翌年（1945年）3月，戴笠又電告潘其武將別動軍參謀處併入中美所。⁴⁹由上可知，就忠義救國軍部隊的訓練計畫與內容，仍然是由戴笠所完全主導；1944年後，戴笠更是強烈主導與中美合作所聯繫合作。

肆、作戰：抗日與反共

忠義救國軍是一支富有戰鬥力的勁旅，其作戰的對象有二：日軍與中共。抗日戰爭期間，忠義救國軍的作戰對象係以日軍為主，就是要配合抗日戰爭的需要和情報工作的蒐集，其具體作法包括收容淪陷區流散軍隊，予以整編訓練，並於淪陷區（游擊隊根據地）展開政治工作，布置諜報交通網，配合江南特工打擊與牽制敵人，並且破壞淪陷區交通設施，以及發動民運、策動偽軍反正，和進行奸偽的捕殺行動等。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蔣中正「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之國軍，其以加強敵後游擊工作」的命令，乃派遣軍政幹部潛入淪陷區，展開收容擴

⁴⁸ 〈戴笠手令雄村等三訓練班由中美所派美方教官訓練及研商緊縮別動軍〉，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215-217。

⁴⁹ 〈戴笠電馬志超等別動軍司令部應與中美所作戰組密切聯繫〉，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242-250；〈戴笠電轉潘其武等將別動軍參謀處併入中美所作戰組〉，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251-260。

編的工作。關於部隊收編，戴笠曾有一電文令何行健轉知施覺民，強調收編部隊時，絕不准擾民的原則，他說：

吾兄數月來在安、孝一帶收編部隊，備嘗艱苦，熱心為國，感佩萬分。當此國難嚴重萬分之時，兄能收編部隊為抗敵之用，弟固歡迎之不暇。惟抗敵固需要武力，但抗敵尤需要民眾，弟殺敵之心甚切，而愛民之心尤切。無犧牲決心者，不能談抗敵，如騷擾人民者，更不能談抗敵也。現兄所收編者，如真能抗敵，如真能愛民，弟自當予以名義及給養；否則，弟實不敢負責，弟不能帶兵亦不敢要空頭之名義。今日之尚經營別動隊者，實因蘇浙別動之使命未盡，不得不如此幹耳。兄知弟甚深，而愛弟尤切，兄之所收編者成分究何如，請就近與行健、一珊兩兄詳商，電復培榮同志。⁵⁰

由上述電文內容得知，抗戰初期的別動隊不僅有擾民之實，還有吃空缺的情形，也引發戴笠的嚴重關切。

此外，有關忠義救國軍的領導幹部方面，戴笠也積極介入並加以慎選，以繼續保持該部隊的戰鬥力。例如1937年電請蔣中正派劉志陸為別動隊總指揮一事，又如1940年又電請蔣中正派周偉龍擔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⁵¹ 但是，由於忠義救國軍高層幹部間一直存在著矛盾，為了達成抗日與反共的目的，戴笠決定向胡宗南借將；1943年4月，他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電文，請胡宗南同意調派馬志超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他說：

目下江南地區異常危急，匪軍盤據茅山近萬人，與江北之匪業已聯成，現企圖佔據天目山與黃山山脈，造成犄角控制江南。而目前能打匪之軍隊尚推忠義救國軍，而忠義救國軍因統率不得其人，基礎已形動搖。最近，軍委會劃廣德、孝豐、安吉三縣為忠救軍後方之根據地，孝豐一帶現亦有匪活動，萬乞兄准調志超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俾該軍負責得人，達成其任務。弟事即兄事也，務乞兄准，為幸。否則，弟此行對該

⁵⁰ 〈戴笠電轉施覺民指示收編部隊準則並詢安孝收編部隊情形〉，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83-186。

⁵¹ 〈戴笠呈蔣中正請准調俞作柏為軍委會參議令派周偉龍任忠救軍總指揮〉，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40-145。

軍之處置，全盤失敗矣。⁵²

文電中，戴笠殷殷盼望胡宗南能接受其請求，歷經近半年的周旋，直到1943年10月馬志超才得以正式就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是以，抗戰期間忠義救國軍在敵後游擊隊根據地收編了的流散部隊，又有了具有才幹的領導者，再加上中美合作所的協助訓練，儼然成為一支驍悍的戰鬥武力。再者，忠義救國軍善用戰鬥方法，結合一切力量，得以遂行其抗日與反共兩大作戰任務。⁵³

事實上，忠義救國軍除了抗日與反共外，歷年來也曾單獨執行行動工作，或配合敵後特工單位執行行動工作，計有制裁敵偽首要之行動248次，破壞敵偽軍實之行動174次，突襲敵偽據點之行動124次，其行動經過及成果，國防部情報局所編《忠義救國軍誌》一書記載甚為翔實，本文暫不予論述。⁵⁴ 本文僅以1943年王嶺戰役和1945年浙西戰役為例，分別說明忠義救國軍在抗日與反共的作戰成效。

1943年王嶺戰役：王嶺位於安徽省廣德縣附近，是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所在地，1943年間忠義救國軍與日軍於此地發生激戰，王嶺基地曾經失而復得。自1943年中期開始，忠義救國軍依照中美合作協定原則，所有敵後部隊重行整編，並輪流調集廣德基地，實施美式訓練與裝備。⁵⁵ 因此，忠義救國軍的戰鬥行動較以往減少，但卻在1943年間發生廣德王嶺基地的戰役。

⁵² 〈戴笠電胡宗南請准調馬超為忠救軍總指揮俾負責打擊共軍〉，收入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頁148-152。

⁵³ 忠義救國軍對敵軍的戰鬥方法計有：無形戰鬥方法與有形戰鬥方法兩種。無形戰鬥方法有三：一、結合淪陷區民眾，發揮黨政軍統合戰力（政治工作）；二、運用情報工作效能，以配合游擊戰爭（情報工作）；三、利用敵偽矛盾，以分化敵偽戰力（心戰工作）。有形戰鬥方法有五：一、行軍；二、宿營；三、戰鬥；四、協同；五、陣中情勢。詳細內容，可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52-60。

⁵⁴ 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97-146。

⁵⁵ 中美合作協定，全稱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中方係由戴笠於1942年12月16日呈請蔣中正批准；之後，交由美方梅樂斯上校，1943年4月1日雙方在美國華盛頓正式簽字；7月1日，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SACO）。根據協定原則，美方應負責協助中國訓練游擊武力，以及情報工作、氣象、爆破等技術；因此軍統局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情報組織、鐵道破壞隊，以及別働隊、忠義救國軍和泰國挺進軍等單位，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訓練和指揮運用。參閱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13-15。

1943年9月，為了策應在京滬地區的地下工作人員之破壞計畫，忠義救國軍第二縱隊第六團奉命經長興越過太湖北岸，挺進江蘇武進，襲擊日軍，與日軍在武進瞿家巷發生激烈戰鬥，傷亡百餘人後，撤回廣德基地擔任守備任務。10月7日，盤踞於宜興、長興、吳興的日軍集結1,000餘名兵力秘密行動，經廣德南行，企圖攻略忠義救國軍王嶺基地。當時廣德基地僅有總指揮部及直屬4個連的兵力，且代總指揮阮清源已調往重慶受訓，新任總指揮馬志超尚未到職，總指揮一職暫由參謀長郭墨濤代理，軍心不穩，警戒亦鬆懈。因此，日軍已抵達王嶺基地北方7公里處，總指揮部才獲知消息，王嶺隨即遭受日軍猛烈攻擊，稍事抵抗後即向南方西溪塢撤退。10月9日，總指揮馬志超日夜兼程趕至西溪塢，翌日（10日）即親自率領才剛自雄村訓練班完成中美合作訓練與接受美式裝備的幹訓隊員400餘人，以及總指揮部直屬之特務營與搜索連，向盤據王嶺基地的日軍展開反攻行動，激戰終日後，日軍不支，乃向廣德方向逃竄，於是收復了王嶺基地。⁵⁶

王嶺基地一役，雖然稱不上大規模的會戰，卻是忠義救國軍抗日戰爭的一種典型例子，即規模不大、傷亡不多，卻能振奮人心，同時達到擾敵的目的。本次戰役能夠順利收復王嶺基地，具有幾項意義：一、馬志超倉促中就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卻能指揮得宜，英勇果敢，終能以寡擊眾。因此，馬志超立即贏得忠義救國軍官兵的擁戴，也使忠義救國軍的戰力轉趨堅強。二、與中美合作所合作，接受美籍教官課程的訓練，以及使用美式裝備的幹訓隊員，確實提升戰力，也給忠義救國軍帶來現代戰略與戰術的啟發。

1945年浙西戰役：1944年冬，日軍積極從事打通大陸路線的攻勢，因此平漢路、桂、柳等地持續發生與日軍大規模的會戰，駐防湘鄂贛邊區的國軍，大部調往粵漢鐵路附近增援，僅留三十集團軍的一個軍駐守湘贛邊境，其餘大都為地方武力和游擊隊，力量單薄而分散。11月，共軍乃乘機由延安南下，八路軍120師賀龍部359旅旅長王震率領15,000人，急攻湖北黃坡大悟山，企圖重建湘鄂贛基地。⁵⁷ 1945年1月，共軍為了澈底解決忠義救國軍，集結蘇北魯南一帶共軍，會合原已潛伏於江南的共軍，由陳毅、粟裕等率領約計29個團的兵力，渡江經金

⁵⁶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77-78。

⁵⁷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137-138。

壇、丹陽、茅山，進攻浙皖邊境，以包圍忠義救國軍。當時，忠義救國軍正防守安徽廣德和浙江孝豐之間的犁壁山、牛頭山、瓜嶺之線。

1月29日，共軍以王必成和陶勇兩個縱隊，由北而南分成兩路向忠義救國軍發動猛烈攻擊；忠義救國軍第二縱隊余萬選部積極迎戰，副總指揮王春暉亦率部增援，激戰數日，共軍雖運用人海戰術，仍未能攻下忠義救國軍陣地。2月3日，共軍重點轉向第二十八軍第六十二師正面攻擊，佯攻忠義救國軍以牽制兵力；2月5日，共軍突破六十二師防地，占領牛頭山。⁵⁸

共軍占領犁壁山、牛頭山、八卦山等地後，休息整補，陳毅率領生力軍趕來會合，準備重起攻勢。2月15日，忠義救國軍奉命先發制人，會同國軍五十軍、二十八軍發動防禦攻勢，激戰到16日拂曉，雙方傷亡甚重；16日下午，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來援，指揮官鮑步超洞悉共軍戰略，並以新式武器的強大火力迎擊。至20日拂曉，共軍死傷已逾3,000人，乃回天目山準備建立新基地，進而控制京滬杭三角地帶。此次戰役，忠義救國軍有效遏阻共軍南侵之勢，使國軍得有喘息整補的機會，同時亦扭轉浙皖邊區戰局，阻止共軍截斷杭徽公路、浙贛鐵路的企圖。

1945年4月，第三戰區副長官上官雲相指揮第二十三集團軍、蘇浙皖邊區司令部、第八十八軍以及忠義救國軍，準備驅逐盤據天目山之共軍部隊，其中忠義救國軍奉命於孝豐以西占領陣地，向東南方的天目山區防禦，以防止共軍向西北方向竄逃。5月17日，忠義救國軍以奇襲方式，直搗共軍腹地，攻擊其指揮部。共軍遭此奇襲，軍心大亂，國軍主攻部隊乃乘勢猛攻，終將共軍擊潰，收復天目山區。⁵⁹

1944-1945年，共軍全力南下，除了企圖重建湘鄂贛基地外，最主要的目的是搶在日軍撤退之前，先占領東南要地，造成既成事實，以阻擾中央政府順利復員。此次浙西戰役，不僅摧毀了共軍上述計畫；且自此之後，在東南地區的共軍

⁵⁸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頁83-85；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139。

⁵⁹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139。

總是迴避與忠義救國軍接觸，使得國軍反攻收復南京的計畫得以順利進行。⁶⁰

綜合上述，忠義救國軍經過美方教官訓練與美式裝備後，其在抗日與反共的戰役上，發揮了極大的戰鬥力，即使到了戰爭結束後，其戰力仍受到重視。1946年4月14日，蘇聯軍隊撤出中國東北，國共在東北的衝突日益激烈；16日，共軍糾集3萬群眾圍攻長春市，不僅在市區發生巷戰，並且攻陷了長春機場；18日，長春陷共；20日，中共揚言攻擊哈爾濱市，在哈中央接收人員乃撤飛瀋陽。⁶¹ 在此東北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就曾致電蔣中正，請求蔣中正將已經改為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的原忠義救國軍，調派到東北負責護路勤務。⁶² 事實上，忠義救國軍已經改制為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其領導者戴笠也於3月17日因飛機失事而身亡了，但忠義救國軍的戰力，仍然受到杜聿明的重視與肯定。

伍、結論

由於情報機構特別重視保密，使得以往各界對「忠義救國軍」的認識有限，也就更難以理解其在抗日與反共戰爭中的貢獻。本文分別從組織、訓練、作戰等三方面，試圖勾勒出忠義救國軍的歷史面貌。在組織方面，忠義救國軍承繼別働隊、別働隊教導團而來，於戰後改制為交通警察總局。1937年別働隊的成立與淞滬戰役有關，其成立目的是為了因應抗日情勢的需要，以及配合情報工作的進行；是以，抗日是忠義救國軍主要任務，而其主要活動地點則集中於京滬杭一帶。無論從組織沿革、人事的安排與組織的整編，都可以看出忠義救國軍是由戴笠所創辦。

在訓練方面，從別働隊到忠義救國軍約分成四階段，其中以第三、第四階段

⁶⁰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140。

⁶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卷6，上冊，頁109-111。

⁶² 「杜聿明電蔣中正懇飭已改為交警總隊之忠救軍來東北任護路勤務」，〈武裝叛國（一二八）〉特交文電—共匪禍國，《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151-180。

最具特色，第三階段以分期分類的訓練方式，奠定了忠義救國軍的學養技能，使之成為思想忠貞的戰鬥勁旅。第四階段與中美合作所合作，藉由美籍教官的授課與訓練，使忠義救國軍對現代化軍事有了初步的啟蒙，對該軍戰力的提升大有裨益，也在後來的抗日與反共戰爭中發揮了作用。觀察忠義救國軍各個階段的訓練內容與方式，尤其是與「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的合作規劃，也都是由戴笠所完全主導，正代表著戴笠意志的實踐。

在作戰方面，忠義救國軍經過美方教官訓練與美式裝備後，無論在抗日或反共的戰役上，都發揮了極大的戰鬥力。尤其是1945年浙西戰役之後，共軍總是迴避與忠義救國軍接觸，也使國軍收復京滬的反攻計畫，免受中共的干擾得以順利進行。

綜合上述，抗戰期間的忠義救國軍，是一支由戴笠所創辦的的戰鬥武力；歷經幾次的整編改制，從一支諜報隊伍到全美式裝備的部隊，其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是以，忠義救國軍可以視之為：一支以戴笠為首組織嚴密、紀律森嚴的戰鬥部隊。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武裝叛國（一二八）〉，特交文電—共匪禍國。

〈籌筆—抗戰時期（十）〉。

〈籌筆—抗戰時期（九）〉。

〈籌筆—抗戰時期（十二）〉。

吳淑鳳等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忠義救國軍》。臺北：國史館，2011年。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4卷，上冊。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6卷，上冊，臺北：未對外刊行，民國67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9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忠義救國軍誌》。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51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

二、年譜、傳記、回憶錄

〈戴雨農先生年譜〉，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下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

〈戴雨農先生傳〉，收入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68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

吳智新，〈軍統見聞點滴〉，《傳記文學》，第61卷第4期（民國81年10月）。

徐文祺，〈我拜識戴笠將軍的由來〉，《傳記文學》，第48卷第3期（民國75

年 3 月)。

鄧葆光，〈我與軍統〉，《傳記文學》，第61卷第 4 期（民國81年10月）。

三、專書、論文

李甲孚，〈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傳記文學》，第67卷第 3 期（民國84年 9 月）。

魏大銘，〈評述戴雨農先生事功〉（上）（中）（下），《傳記文學》，第38卷第 2 期（民國70年 2 月）、第38卷第 3 期（民國70年 3 月）、第38卷第 4 期（民國70年 4 月）。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4年。

張霽之，《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

四、網路資料

戴氏宗親網網頁資料，網址：<http://www.dai888.net/Photo/view.asp?id=74>（2011/ 9 /19點閱）。

百度百科網頁，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106711.htm>（2011/ 9 /19點閱）。

百度百科網頁，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25766.htm>（2011/ 9 /19點閱）。

謝哲邦，〈關於劉志陸的一點史料〉，載廣州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 4 輯。廣州：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網址：http://www.gzxws.gov.cn/gzws/cg/cgml/cg4/200808/t20080827_5100.htm（2012/ 6 /12點閱）。